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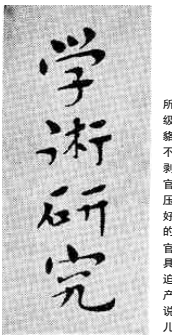




1







第一期

周谷城：“清官”  
贪官是  
一丘之貉，但又完全不  
有区别。“清官”纵  
有好处，毕竟没有什  
么了不起。

关于所谓清官、贪官。（一）所谓清官和贪官，既然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那末说它们都是一丘之貉，或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有很大的不公道。（二）不过在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的前提下，说清官与贪官彼此全无区别，确与事实不符。压迫轻一点的比压迫重一点的总要好些；剥削少一点的比剥削多一点的总要好些。进一步说，清官与贪官固都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但清官能利用政治力量，强迫人民兴修水利等事，从而发展生产，未尝于人民毫无益处。就这点说，所谓清官，只要真能做一点好事，到底要比贪官好一点人民。（三）但清官之所作为，于人民或有暂时的些微利益；执获的却是统治阶级本身的延长或巩固，这是与人民对立统治阶级，彻底肃清清官的期望完全相反的。这里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作用。就这点说，始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清官，纵有好处，其好处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甚或不能掩盖其罪行。

关于所谓“肯定”、“否定”。（一）肯定与否定与否，就目前用法看，所指似乎完全属于评价范围，与历史的存在与否，不是一事。历史人物或事情，其影响可能因评价而异；但存在，不会因评价否定的评价而可能不存在。（二）现在所谓评价，多是重行评价。如对某人过去评价太高了，否定其一部分或全部；对某人过去评价太低了，肯定其一部分或全部。时代变了，评价自然不同。不过因人物或事情本身的存在，扩大一点说，历史本身的存在，不会因评价而变更。（三）我们研究历史，最重发现规律，最重阐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趋势明白了，于评价人物要方便得多。不过，于关键性的人物之所作为，摸得清，于发现规律，阐明趋势，又有直接帮助。

平心：把清官同人民之间的界限勾销是荒唐的，但是把他们同贪吏、豪强之间的区别划去也不能算。对清官的批判有两条标准：一是现实的政治是非；二是历史是非。清康熙帝、明朝嘉靖、兴修水利、扶植农业、整饬吏治、减免赋税以及比较关心人民的“良相”、“循吏”，实不絕书。他们的“德政”、“懿行”不是经过了一些封建统治阶级的、但是，史籍上的记载，多少透露了清官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的形象。把他们同古代的暴君污吏、奸权豪强看作一丘之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清官同封建国家的一般官吏有共同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义务，又有同他们相异以至彼此矛盾的一面。如果等大了后者，把清官同人民之间的界限一笔勾销了，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忘记了后者，把他们同贪吏、

## 北京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清官”问题

编者按 《新建设》编辑部于今年二月二日邀请北京部分学术界人士，就“清官”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并于该刊今年一、二月号合刊，发表了与会者的发言。现将发言摘要转载如下。

吴世昌：“清官”实行改良，至少使老百姓少受剥削、少受罪。说贪官比“清官”还好，是在三个朝上说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贪官比“清官”还好，因为贪官比清官多，起了农民的反动，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溃；“清官”则束缚了阶级斗争，延缓了王朝的崩溃。主张这个原则的人，是站在后一个王朝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说的，这个原则是农民反抗旧王朝的崩溃，好处是被下一个新王朝的统治者得去了，农民是得不到的。贪官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很厉害；“清官”实行改良主义，缓和阶级压迫，至少使老百姓少受剥削、少受罪。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当然是少受剥削、少死人好。如果贪官比“清官”好，客观上就会使人认为应当赞成贪官，打倒“清官”。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去，秦桧就会比岳飞好。金兵入侵时，宋朝的主要矛盾是外族侵略。秦桧主张缓和这个矛盾，他当奸臣，与敌人勾结，人民反对他，这就加剧了人民与宋王朝的矛盾，岳飞抗金人，朝外派，人民赞成他，有人可能会说，人民就会因为宋朝政府里还有这么一个爱人民拥护的岳飞，而认为宋朝政府还不错；这样，岳飞一来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宋王朝的崩溃吗？秦桧反岳飞之道而行，加剧了阶级矛盾，加速了宋王朝的崩溃，似乎秦桧倒比岳飞好了。这就是贪官比“清官”好的原则所得出的结论。

唐兰：下结论的时候，清官对人民有好处处，要根据其具体事实分析。“清官”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清官这个概念，不是那时候有的。关于包拯的传说，是从元朝以后才慢慢形成的，那时似乎还没有“清官”这个名词，明朝的海南岛后，也叫他做“忠介”，没有叫他“清官”。大概康熙时提倡“清官”最力，影响，使后世才叫“清官”。提倡“清官”，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的。现在有些文章说，“清官”出现在封建王朝下下坡路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想，康熙时就是“顺治”，不过，他的贪污可能很厉害。贪官多，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康熙时特别提倡“清官”。“清官”受到重用，就是因为他们对封建统治者“赤胆忠心”，康熙时的彭鹏、成友、施世纶，都是效忠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王朝的。

“清官”对人民没有好处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每个“清官”有其具体情况。（一）“清官”有的某件事，对人民可能有一些好处。例如海南瑞昌修筑了一条路，一方面是以工程招集农民，缓和阶级矛盾，使人民休息，为了解决巩固封建统治的利益；另一方面，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但就他整个的人来说，不过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工具，对人民是不利的。至于老百姓是否说“清官”好呢？在那个时候，一个地方上，百姓说：“顺治不好；海瑞死了，乡绅叫人们去造反，造反不去；施世纶死后，有人写信给人拿出一封状，给他爹送去，说他不孝。”文士：地主阶级给他一文钱，老百姓给他也不收。当然，他还有那些老百姓说受了欺骗而说“清官”不好，但是，我们今天却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老百姓说得好，那时，老百姓只是盲目崇拜“清官”而已，但碰到的大都是贪官、贪官，有些“清官”象海瑞之类，在封建官僚中能成品行好一些的，也没有那么太多罢了。但有些“清官”象于成龙之类，镇压农民起义凶凶，是手上沾满血的刽子手，那就罪大恶极了。无论何人，对于整个“清官”，我们应该予以否定，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学习的典范。

有些人说贪官比“清官”还好，但是不客观的。对比起来，“清官”总比贪官好一点，海瑞比严嵩总要好些。只从清廉的一点来讲，“清官”与贪官仅相差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还是差一点吧！一锅煮了，没有区别，就没有进步之说了。“清官”是封建社会的迂腐的卫道士：道者。不能说他们有多么好，但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清官”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假象。它是很迷惑人的东西。封建王朝总是兼并成风的，非法侵占很多，削弱了封建王

## 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笔谈“清官”问题

编者按 上海《学术月刊》今年一月号，发表了《关于“清官”讨论笔谈》。下面转载的是笔谈的摘要。

豪强之间的界限一概划去了，也是不能叫人心服的。

吴晗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抹煞了清官同人民之间的分界线，从而把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和王法给抽象化了；同时严重歪曲了明代农民的历史形象，取得了人民在历史上的斗争作用。这种“古为今用”的歌颂和论断，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不能不产生极坏的影响。

能不能因为吴晗同志在海南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就走到另外一端，不分皂白地把历史上的清官一概抹黑呢？这是关系到讨论历史是非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循吏”“良吏”，本来应当作具体分析，分别评价，不能笼统对待。他们之中，的确有一些是被统治阶级过分美化了，使有善良的偶像人物。他们在历史上的破坏作用和腐蚀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甚至有些所谓名臣的“善政德业”，根本就是移史伪造的。对于他们，有些有奸臣的份儿，可是，在所谓清官中，确有不少是对人民作了一些有益的事，减轻了人民的一些痛苦灾难。他们的某些业绩，甚至对后世都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如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保护水土之类）。怎能因为他们生于当时的王朝和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贬低一棍打倒呢？如果说把清官捧上九天，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就把他们一概打倒于十八重地，又是犯了“左”倾的错误呢？

对于海瑞之类的清官要不要批判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批判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按照现实的政治是非，另一条是按照已往的历史是非。任何一个清官，如果他在当时坚决捍卫整个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如果他能顽强地维护反动劳动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轨道的传统制度，这就不仅应当肯定当时的劳动人民大众对于敌对的地主，而且应当肯定为现代劳动人民反对两个对敌的官营，被指为现代剥削阶级的远祖（这里不是指血缘关系的远祖，而是指阶级关系的远祖）和先行者。他们的思想感情究竟应当站在哪一方面呢？这就必然涉及现实的政治是非问题。可是，历史人物毕竟是过去的人，古人，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无产阶级专政棍尺去衡量他们，要求他们同现在的革命专政家一样对待人民；对于他们必须依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认真分析，分别对待。假如有人认认为凡是清官，都是历史罪人，同所有的贪官污吏、奸权豪霸、民霸国没有一丝一毫区别，那是把马克思主义十足庸俗化了。难道无产阶级只是旁观现实政治是不问历史是非的帮凶力量吗？不同意这种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论调。

束世澄：不同意“清官”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器。我调节器。“清官”的提法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幻想，评价“清官”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所谓“清官”，只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大都出在每一个王朝的

中年以后。有人说，清官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这个论点我不能完全同意。所谓清官，指的是地方官（良吏、循吏）。个别地方官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局部的，对整个王朝政局不能起调节作用，更不能对“封建制度”起调节作用。

清官的情况有些特殊，它影响虽小有虚名，而这虚名在他死后才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政治幻想”。拿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的历史来看就很清楚。封建制是需要利用政治幻想进行统治的。在阶级矛盾尖锐化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也不能不愚弄政治，就要更倚靠政治幻想，“清官”的高大是封建政治幻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歌功颂德，无非是借以宣扬“王法”是公正的，封建皇帝是力求政治清明的，以此达到对民众的欺骗。

“清官”在中国有它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爱民如子”。这话，一方面说是欺骗，一方面也是对清官本质的自我暴露。为什么说这是欺骗？清官是“忠君”的，又确有可能是同情人民的一些举动，忠君与爱民不免有矛盾。清官是怎样把忠君和爱民统一起来的呢？那就是：“爱民所以爱君也”。“爱民是手段，爱君是目的”；爱民或是爱君，爱君是本质。这种“清官”不能不说是欺骗。何说是自我暴露？关键就在于从“知”的含义。这就是“清官”要做人民的爸爸，要骑在人民的头上。在我国封建时代和半封建时代不仅有封建的统治，还有宗法制的统治。在宗法制度下，妻、子是家长的奴隶，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理所当然，不能反抗。“清官”之镇压农民起义、屠杀人民，也是“爱民如子”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宗法的双重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旧传统，所谓“清官”，不过是旧传统的忠实执行者，这是它的特点。

评价清官必须首先认清它是封建统治工具之一，本质上是反动的。但个别清官如果真正做了一点好事，能否予以肯定？从马克思主义讲来，我们对于个别清官也要分别对待。如果说清官与贪官一视同仁，总不能解决问题。困难的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好坏。

在我看，区分的标准是否为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生产。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看，阶级社会的更迭是逐渐进步而不是退步。因此可以肯定，在古代社会时，社会生产发展，则劳动人民能接近彻底解放；但社会会前进一步，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机会也就多一些。社会生产的发展，关键是巨大的。某一清官如曾做过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事，关系是局部的，清官仍可对此一件事加以肯定，不夸大、不缩小、不埋没他的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生产力的推进，受益的人多半是剥削阶级，农民受益很小。拿“于谁有利”来衡量，是否对这件事也不能加以肯定？在我看，不能这样看问题。生产斗争的本

否定“清官”，是不是就抹黑了历史的光明面？不。中华民族有它的伟大的、光明的历史，首先应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劳动人民的光明历史。过去历史对于人民的论述太少了，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调查、去发掘。如果不去找真正的人民的光明面，而用一些地主阶级的东西加以美化，冒充人民的，这才是真正丑历史本质。

贺麟：旧知识分子怕阶级斗争，总想搞阶级调和，说“清官”是封建制度，是搞了“清官”的阶级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旧知识分子在改造旧世界观方面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害怕阶级斗争，不想参加阶级斗争。怕斗争革命，也怕斗争自己，总想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搞“阶级调和论”，以此作为精神依托，安慰自己，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

“清官”是皇帝的忠实奴才，根本不会骂皇帝。忠孝与民是两回事。魏征是唐太宗的忠臣有时很勇敢，很客气，但这不叫骂。大臣子曾国晋曾上书过《敬疏唐太宗三疏》，向咸丰皇帝提意见，咸丰看了很生气，把他的奏折摔在桌上，要他再写。经他的老师和朋友求情后，还得到“优诏复奏”。有时封建官僚对皇帝不满的情况是有的。而直隶则没有私人抱怨和反抗的意思。“清官”骂皇帝，无非是忠心耿耿，用直隶的方式拱卫皇帝皇帝好。“清官”和贪官之间，忠臣和奸臣之间没有矛盾，有矛盾。但他们双方都拥护皇帝。忠臣死心踏地的为皇帝，皇帝死心踏地的为皇帝。这同“清官”说，这同“清官”作为忠臣的形象和本质有矛盾。吴晗同志说“清官”骂皇帝，似乎以海瑞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他显然是没有搞清楚“清官”的阶级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

冯友兰：旧知识比新知识，清官的行动说不上改良主义，而是卫护封建制度的基础。

赵天仪：清官，目的是美化封建制度。海瑞先生开过头，说地主和农民都说“清官”好，可能是由于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也有一致之处。这个解释很不妥当。后来海先生举了大量的史料，证明“清官”是由皇帝定定的，是由地主阶级捧起来的，这就取消了原来的矛盾。

说“清官”“清如水，明如镜”，就是说，他比较不贪脏枉法，断言旧知识比新知识。在封建社会中，贪官、奸臣、腐败流，实在是到处是，冤冤到处是。如果有个别的官，能平反几件冤案，在当时是可以使人民心一快。平反了个别的冤案，对个别人有好处，但对于无产阶级不会有多大好处。

“清官”的这些行动，说不上改良主义，更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那样“推出封建制度的基础”。恰恰相反，“清官”的行动是卫护封建制度的基础的。“清官”无论是“清”或“污”，他都是“清”。封建制度是存在的基础。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评价“清官”，对“清官”不能盲信。对“清官”大肆吹捧，其目的是美化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封建制度。这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一种手段。

翁独健：从历史条件来看，比贪官较好的“清官”是有，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

“清官”，人民中间也有“清官”的概念。“清官”从本质上说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不同的意见了。现在还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从“清官”是剥削阶级来说，都是剥削，有什么“清”“污”？这样，也可以说没有“清官”。但是，从历史条件来看，从剥削阶级内部来讲，相对地说，还是有“清官”的。他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剥削，同贪官相比，是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官僚。我们向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来看，从他们来阶级来说，比贪官较好的“清官”是有，有的。当然，历史上的“清官”不多，而且有其真像。特别是戏剧、小说中所描绘的“清官”，更不是历史的真实。

封建统治阶级提倡“清官”，这不成问题。从历史条件看，人民中没有“清官”的观念呢？我看也有。这并不奇怪。第二、清官”与贪官哪个好？从一定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看，相对地说，“清官”和贪官是有一个区别的。清官总比贪官好一点，个别的冤案是平反了，对人民有一些好处。“清官”比贪官好，自然是有冤的冤，影响历史发展的不是他们，就是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清官”也谈不上不好。我们从一定的历史条件看，可以说“清官”比贪官好，但是把他们抽出来说，今天的人去学学他们，我认为是不对的。

杜任之：我认为，从历史条件来看，产生“清官”的思想根源，对“清官”和贪官都要一分为二。历史上“清官”还是有的，他们是相对于贪官而言的。历史记载上的“清官”，是统治阶级加以吹捧、大加功夫夸大而塑造成的。中国是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统

身就是一种革命，是由劳动人民进行的。在生产斗争中，劳动者改造了世界，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在封建时代，社会生产的推进，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时促进了封建统治的死亡，不能不说对农民无益。

丘旦庆：对历史上的清官要一分为二。散播对清官幻想的论调必须批判，但是不能把清官与贪官等同起来。

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清官，必须依据一分为二的规律。（一）对于历史上的清官，要看它同贪官相同的一面，它们同是对农民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说，或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丘之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清官同贪官不完全相同的一面。一般来说，清官比较严格维护封建纲常和法，为了巩固封建皇朝根本利益，作了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人民当时的某些愿望，例如平反一些冤狱，赦押一些强盗，或兴修一些水利，或作出一些改良。当然，我们对于这些清官的现象，又要看到它的危害性。

统治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某些活动或措施，既代表或符合它本身的长期的、根本的利益，又符合农民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暂时的或非根本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否则，矛盾何从缓和？这绝不是“合二而一”的观点。当然在用语上，这只能说“既代表或符合它本身的长期利益，又符合农民阶级的暂时利益”，而不能说“既代表或符合它本身的长期利益，又代表农民阶级的暂时利益”。历史上的清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是可以作出一些事情在客观上符合于农民阶级当时的短暂的利益的。把这些事情（措施）从长远的利益和暂时的利益分别来看，是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

（二）历史上封建皇朝和封建文人大肆宣传、美化清官的高大形象，人民群众因受前朝者的影响而对清官产生不健康的、落后幻想，只看到贪官同人民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清官也同人民对立的一面，认为不要革命，不要改变社会关系，有了清官就能解决问题。这些今天都应该受到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三）但我们在这揭露和批判清官的同时，又不能再将它同贪官完全等同起来，应该全面地评价，就要看到在本质上它同贪官相同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同贪官不完全相同的一面。

郝居衡：剔除“清官”的封建性糟粕，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借鉴。

什么是清官？包括刚正无私、有正义感、不糊涂，最主要的还在于不贪污，不向人民伸手或向人民伸手。这样，就减轻了人民的剥削，也反对封建王朝的罪恶。拿海瑞说，就作过不少减轻人民剥削的事，这难道不可贵的。

每一个封建王朝上升的时候，贪污的现象比较少，一到了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往往腐败的风气，清官的出现，常常在这个时候。海瑞的时代，正是这个时候。海瑞不必说，号称好宰相的徐阶也拥有四万田亩良田，张居正死了以后，为了奔丧，用二百民抬着他把他抬了回去，沿途的铺张浪费，那还用说吗？比起海瑞来，死后清官遗产只有一百五十两银子（一说十多两），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到底在哪一方面，这是很明显的吗？

我们有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子，占人也有一把尺，那就是封建道德、法律和习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子去衡量它作出合理的判断，是可以的，若以之要求古人，那就等于苛求古人，强迫古人去学古人之亡了。清官值得值得不敬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剔除封建性糟粕”，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是可以的，歌颂就不必了。

机构制，层次很多，在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方面，很容易发生农民中饱的现象，封建统治者便提倡“清官”以限制贪污中饱，这就是产生“清官”的社会根源。其次，儒家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仁学”、“仁政”与折衷主义的“中庸之道”。“清官”的思想根源是从这里来的。

无产阶级要重新写历史，因之也要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般说来，对“清官”和贪官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要一分为二。“清官”和贪官是不同的，这是对封建统治的一分为二。看待“清官”的作用也要一分为二。“清官”一方面巩固封建统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长远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中，作了有利于一部分人民的好事。这有利于人民的一面又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对人民有好处；另一方面又对人民起了欺骗和麻痹的作用，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幻想，特别是经过戏曲、小说的渲染，更有麻痹人民的作用。

对贪官也要一分为二。贪官一方面利用封建制度，压迫更迫，在当于有害于人民；另一方面又利用人民对封建统治的憎恨，起了促进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作用。这又是坏事变好事。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证法的发展。

封建统治阶级提倡“清官”，是朱光潜：为了对人民起麻痹作用，我们今

天还有什么必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究竟有没有“清官”？大家都是从历史上说的。过去历史的这写笔调，究竟可信到什么程度？可不必谈，就从我们自己已经历过的事情想，我想可以快些了。经历了清朝末年、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到孙科的时代时，就我知道的官想了一想，究竟哪一个“清官”？找不出来。要不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大家说“清官”是皇帝“钦定”的，封建统治者提倡“清官”，是为了他们的统治政治，对人民起麻痹作用。封建统治提倡“清官”和贪官分开了，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有什么必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这对我们说明历史究竟有什么好处？

马克思说，资本家要尽量剥削工人，还要给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以便继续剥削他们。我想，过去一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都是这样，都有一个既要尽量剥削他们，又要使他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以便继续剥削他们的矛盾。贪官是剥削到地，不管人民的死活；“清官”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使农民能够活下去，继续剥削他们。

翁伯贤：“清官”问题不可轻视。“清官”在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历史条件是找不出来的。建议解剖几个“清官”，弄清真象。

“清官”问题并不小，不可轻视。尽管“清官”在历史上不占多大地位，但对“清官”的认识，却涉及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而且“清官”问题还不仅是一历史学上的问题，又是文学和戏剧学上的问题。

对“清官”的本质，已经没有分歧的意见，现在存在看这样一个问题，即“清官”与贪官哪个好？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刚才几位同志提出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历史上是不写了一些“清官”的，问题就是这些存在历史上的“清官”，算不算“清官”。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传》中写了一个“清官”公仪休。公仪休是鲁国的国相，以高才而鲁相，他爱吃鱼，有人投其所好，送他鱼给他，他不接受。说：“今为能自给鱼，今受鱼而食，谁给我鱼者，吾不敢受也。”这个故事，很清楚地说明了公仪休是不贪，而是因为怕失去自己的地位。

真正的“清官”在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因而要想在“清官”与贪官之间画出一条界线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画，那不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题，是贪的多少问题。有些文章画了“清官”圣法、贪官枉法，好象从这里面可以画出一条线。《史记·酷吏传》记载杜周治法，只按皇帝的意图，不按法律，有人责备他，他说：“三尺法安在哉？主所是则为律，主所是则为条，当时是者，何古之有！”这几句话说出了封建时代法律的本质，也说明了圣法枉法之所由，即主是出了封建前主之所是，一个是遵循前主之所是而已，前主与后主都是封建皇帝，因而实际上都是执行封建统治阶级的律令，去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

为了更深入地展开“清官”问题的讨论，我建议解剖几个封建史学家所宣传的“清官”，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清官”，“清”在那里，“清”到什么程度，也解剖几个贪官，看看他们与“清官”有多大的差距。同时，对那些宣扬“清官”的公案小说，也翻出评论来评，指出封建文人是怎样而为了什么目的制造这些“清官”。

